

# 遏制战略的连贯、流变与衍生

——评《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

刘中伟

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曾明确地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的大战略一直是建立在遏制理论基础上的,即挫败苏联的扩张目标以使苏联有朝一日不得不面对其内部的种种矛盾。<sup>①</sup>此言不虚。具体来说,遏制战略不仅是美国和西方的对苏战略,更是美国事实上的国家大战略,更是被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奉为保障美国国家安全、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所必需的全球权势环境的大战略。

然而,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国家安全政策的战略理论和实践成效如何,并没有得到系统的评估和梳理。在此背景下,时任美国俄亥俄大学(现任耶鲁大学)教授的约翰·加迪斯(John L. Gaddis)于1982年出版了《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这本书史料翔实,气势开阔,为全面理解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也为如何审视冷战这段特殊的历史提供了大战略视角的有力分析。

---

<sup>①</sup> George Bush, "The Future of Europ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July 1989. 转引自张小明:《乔治·凯南遏制思想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25页。

## 一、融通理论与历史研究的学术理念

约翰·加迪斯长期任教于美国俄亥俄大学,1997年后调任耶鲁大学历史系任罗伯特·洛维特军事与海军史教授。加迪斯以研究美苏冷战史见长,在多方面颇有建树,被认为是美国冷战史研究的权威,在美国和国际学术界具有广泛的影响。笔者认为,加迪斯学术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对方法论、理论与历史研究的内在关联具有独树一帜的思考。

### (一) 科学方法和历史方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融通

秦亚青教授认为,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分歧在方法论上产生了国际关系学两大方法论学派的论争——实证主义和解释学派之争。<sup>①</sup>如果按照这一分类标准,加迪斯的治史方法显然属于解释学派,而且属于解释学派中的历史方法一支。不过,加迪斯的治学道路显然比单纯的解释学派更为开阔,这表现在他对科学研究和历史研究方法的圆通运用上。

一般而言,科学方法论以实证主义为基础。实证主义“强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实质上的统一,并力主社会科学应该揭示社会生活的客观世界中存在的、能够解释可观察现象的因果规律,认为社会现象可以通过观察、假设、试验得到解释”<sup>②</sup>。20世纪50年代逐渐开始流行的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方法断言,人类事务特别是国际关系领域不但存在一系列可辨识的科学规律,而且可以通过对科学规律的揭示而得到解释,其预测能力可以如同化学家或物理学家实验室的试验结果一样准确。<sup>③</sup>加迪斯对政治学研究者过度痴迷于科学方法的倾向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科学研究的领域分为两大类——可复制或重现的研究客体与不可复制或重现的研究客体。自然科学的“硬科学”标准方法论是建立在实验室的科学试验基础上的;而与之相区别的是包括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都使用的“软科学”研究方法,其特征是既涉及历史事实的连接,又涉

① 秦亚青:《国际关系研究中科学与人文的契合》,《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第78—80页。

② 秦亚青:《实证主义与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人大国际评论》2004年第1期,第18页。

③ John Lewis Gaddis, “Expanding the Data Base: Historians, 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the Enrichment of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2, No. 1 (Summer, 1987), p. 5.

及思维在大脑中的重现、构建与想象。加迪斯指出,政治学研究者的一个误区在于经常混淆这两大类研究领域,把大量不可复制的现象当作实验室科学来研究,期望通过相同的反复操作重现结论。不少尊奉实证主义科学方法的学者还有一个误区,那就是没有认识到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社会现象与人类行为的极端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加迪斯认为,在涉及社会现象和人类行为的研究中,任何一种变量的增加或其运行环境的微小变化,都会引起研究难以控制的复杂变化。为此,他引用了气象学家洛伦茨(Edward Lorenz)所提出的“蝴蝶效应”<sup>①</sup>来具体说明社会科学研究的复杂性。

但是,加迪斯并没有因为科学方法的弊端而一叶障目。在他看来,历史学方法与包括行为主义在内的政治学研究方法走了另外一个极端。他认为,与行为主义对研究方法科学性的过分追求相反,阐释学派的历史学家倾向于抗拒对方法论的认真思考。许多历史学家不愿意把历史学看做是一门科学,而宁愿把它当作一门艺术。对这些历史学家而言,历史研究就如同在海边捡贝壳,然后再把这些贝壳按照某种方式排列起来。但是,这样做无助于优化我们的判断。其结果是,“许多历史学专著的概念性贫困——一种源自历史学家对其研究问题系统性组织的习惯性抗拒、对理论假定之规范性追求的习惯性抗拒以及对其意图说明的习惯性抗拒”<sup>②</sup>。加迪斯援引戴维·菲斯特的研究归纳指出,历史研究中溯古主义、现代主义以及专题主义的存在,不仅反映了很大一部分历史学家方法论意识的贫困,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历史学研究的发展。<sup>③</sup>

加迪斯指出,所有科学研究都需要思维的试验,政治科学与历史科学的研究都涉及人类行为这一关注对象,都适合于用软科学研究方法、采纳想象以及反事实的逻辑思考方式。因此,政治科学与历史科学的研究存在共通之处,不

① “蝴蝶效应”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气象学家洛伦茨首次提出。为了预报天气,他用计算机求解仿真地球大气的13个方程式,其中条件微小的差异引出了大相径庭的试验结果。洛伦茨形象地指出,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有可能会在美国的得克萨斯引起一场龙卷风。“蝴蝶效应”常被引用来指涉科学研究中的非线性的混沌状态。

② John Lewis Gaddis, “Expanding the Data Base: Historians, 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the Enrichment of Security Studies,” p. 10.

③ Ibid., pp. 10—14.

应把它们严格对立起来。<sup>①</sup> 行为主义、结构主义与演进主义之于预测冷战终结无一例外的失败说明,任何方法论都有其应用的边界与固有的缺陷。因此,在他看来,真正可取的研究态度不是不同方法论的对立,而是方法论的综合:“我的观点不是主张丢弃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科学方法’,而是认为优秀的科学家应当像优秀的小说家和历史学家一样,在预测未来的时候要用一切可能的工具进行方法论的革新。这不仅需要理论、观察、严格的推算,同样包括叙述、类比、矛盾、反讽、直觉、想象以及风格。”<sup>②</sup>

### (二) 档案文件与冷战史研究

为了解决因方法论而产生的政治学研究与历史学研究的隔阂,加迪斯提供了一个共通之术,即对档案文件数据库的有效利用。要采取这种方法,就不仅要改变历史学家对档案文件的“海边捡贝壳”式的单一利用方式,也要改变政治学家漠视历史档案的现状。当时,美国大量政府文件的解密试验这种方法,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加迪斯以美苏核威慑关系中美国方面部分档案的解密为例,具体论证指出,如果缺乏档案数据的有效利用,研究的效用就会在很大程度上遭受严重质疑。在进行这种研究之后,加迪斯得出的有益结论是,要以档案数据库的利用为契机,将历史学家的“连贯”与政治学家的“系统”结合起来,寻找一种历史学与政治学研究融通的新起点。<sup>③</sup> 有学者评价说:“加迪斯的一项见识——强调历史的复杂性,并认为这种复杂性决定了学者应当通过对档案的挖掘而不是依赖构建‘优雅’的理论来研究历史的观点——在美国学术界很快就占据了优势地位。”<sup>④</sup> 随着冷战结束而带来的档案文献的不断解密以及这种“新史学观”的实践,带来了“新冷战史”研究的一时兴盛。<sup>⑤</sup>

① 参见 John Lewis Gaddis, "History, Theory, and Common Ground," pp. 82—84.

② John Lewis Gadd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7, No. 3 (Winter 1992/1993), pp. 57—58.

③ 参见 John Lewis Gaddis, "Expanding the Data Base: Historians, 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the Enrichment of Security Studies," pp. 14—21.

④ Michael Cox, "Book Review: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Vol. 73, No. 3,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uly 1997), p. 582.

⑤ 戴超武:《“新冷战史”与冷战后美国外交史学思潮的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6期,第42页。

### (三) 历史、理论与战略研究

加迪斯不仅对历史学家“海边捡贝壳”式的研究方式提出了批评,更进一步批评了在战略研究中历史学者所具有的方法论与严谨理论构建的双重贫困。加迪斯指出,理论通过理清过去的机理来为现实提供关于未来的预测。<sup>①</sup>就具体问题的研究而言,如果没有关于问题是什么以及我们需要知道什么等基本的理论诉求,历史学家的研究将寸步难行。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历史有赖于理论。<sup>②</sup>为此,历史研究不但需要科学方法的补充,同样需要抛弃对细节的专注,树立一种宏观视野,从而实现历史科学的明晰化、系统化与理论化。

正是在对方法论、理论与历史研究的努力思考中,加迪斯确立了在战略史研究中实现理论化的必要性,并进一步坚定了从历史角度思考大战略的信念,从而找到了一条历史、理论与战略研究的连接之路。在这个问题上,加迪斯的观点得到了具有相同学术旨趣的历史学者保罗·肯尼迪的呼应。他们都认为,“培育战略领导人的最好办法,当然也是我们理解战略领导的最好办法,是学习历史上大战略如何被缔造,如何被贯彻。战略思想家和实践家,从公元前6世纪的孙子到当代的首席执行官们必须在他们的历史环境中来予以考察。只有通过历史研究,才能产生对于什么是大战略、大战略如何运用以及战略家在具体的环境中如何思考和行动的正确理解”<sup>③</sup>。

加迪斯指出,因冷战结束而带来的大量档案文献的不断解密,必然导致“新冷战史”的出现。<sup>④</sup>《遏制战略》一书正是加迪斯基于对历史与大战略关系的深刻理解,高超地展示了历史研究的理论化需求与理论考察的有机贯通,从而很好地诠释了历史、理论与战略研究的内在连接。

---

① Charles A. Mclelland, *Theory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New York: Macmillan, 1966), 转引自 John Lewis Gadd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p. 6.

② John Lewis Gaddis, “History, Theory, and Common Ground,” p. 83.

③ 时殷弘:《从拿破仑到越南战争:现代国际战略十一讲》,北京,团结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④ 戴超武:《“新冷战史”与冷战后美国外交史学思潮的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6期,第42页。

## 二、《遏制战略》的主要内容与观点

《遏制战略》一书要说明的基本问题是,美国 1947 年以后的国家安全政策不能被归结为一个反对苏联威胁的单纯程式,它是两股反向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第一,美国是否在全球范围扩展过度;第二,美国是否只能专注于那些对其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地区。<sup>①</sup> 围绕对这两个问题的争论,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前后相继,描绘了一幅遏制战略内在连贯、流变与衍生的合成图景。

### (一) 乔治·凯南与遏制战略的起源

加迪斯指出,不管是“同魔鬼携手共度难关”的战时大战略,还是关于战后大国共管秩序的勾勒,都反映出罗斯福总统力图通过互信构建美苏合作的蓝图。但是,“有予有取”战略的失效和苏联的“不可渗透性”终结了这一期望。杜鲁门总统的上台正式宣告对苏新战略的来临。而扮演这一美国大战略奠基者角色的,是时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临时代办的乔治·凯南。

“在外交史上,难得有单个人在单一项文件的篇幅之内,表述如此有力和如此能说服人的思想,以至立即改变一国的对外政策方向。然而,这就是凯南在 1946 年 2 月 22 日从莫斯科发出的八千字电报的效果。”<sup>②</sup> 在对凯南的评价上,加迪斯同意亨利·基辛格的论断,“凯南在创立他那个时代外交理论方面所起的作用不亚于我国历史上的任何外交家”<sup>③</sup>。加迪斯通过对凯南遏制战略思想的详细剖析后认为,“无论是强调凯南的思想塑造了政府的观点,还是强调它反映了政府的观点,都过分简单化,因为事实上它兼有这两种性质”<sup>④</sup>。不过,他认为,凯南的“八千字电报”与“X 文章”论证了美国的利益所在,颠覆了美苏合作的理论基础,为美国确立遏制战略提供了理论指南。

① Michael Cox, "Book Review: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pp. 582—583.

② 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时殷弘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5 页。

③ 沃尔特·艾萨克森、埃文·托马斯:《美国智囊六人传》(王观声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8 页。

④ 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第 56—57 页。

### (二) 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遏制战略的内在连贯与流变

加迪斯的《遏制战略》一书有两条清晰的线索,它不但构成了该书的写作线索,而且还构成了战后美国遏制战略的演变线索。这两条线索是:第一,战后美国历届政府不变的战略目标;第二,对可用手段的不同评估。在对遏制战略目标的护持上,历届政府体现了高度的内在连贯性;而对可用手段的不同评估,则导致了遏制战略具体面貌在美国不同政府任期内的大相径庭。

#### 1. 遏制战略的目标

乔治·凯南把遏制苏联以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作为遏制战略的目标。美国对苏遏制战略的历程表明,这一战略目标得到了连贯、一致与清晰的遵守。加迪斯指出,尽管遏制战略在实施过程中衍生出一些与其政策设计者初衷颇为不同的本末倒置,但该战略在目标的设定上大致遵守如下的判断程式:

(1) 确定美国国家利益,根据利益设定遏制战略的终极目标。战后历届美国政府都认为,美国的安全系于全球均势体系的维持。<sup>①</sup>加迪斯认为,虽然不同政府对于实现利益的手段之界定方式各不相同,但历届政府及其政策设计者在美国根本利益的认定上达到高度一致的连贯。历届政府都把至关重要的利益界定为在一个多样性的世界上维持均势,以此来避免美国遭受任何一个压倒性的全球权势的威胁,从而护持美国人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促进美国的国家安全与经济繁荣。

(2) 根据目标辨识威胁,根据威胁设定主要对手。从杜鲁门政府到卡特政府的历届行政当局都认为,苏联是世界上唯一能力与敌意兼备的、能够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因此,美国大战略的目标必须是遏制苏联。凯南论证说,基于历史、心理、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理由,苏联不能被期望是一个可能的和平协作伙伴。苏联内部存在的“结构性障碍”消除了美苏修好的可能,因为不同于美国在现存国际体系内寻求安全的诉求,苏联谋求的是改变现状。凯南的论证实质上为杜鲁门政府、艾森豪威尔政府、肯尼迪—约翰逊政府、尼克松—福特政府与卡特政府所共同接受。因此,可以说,没有苏联的威胁,就

---

<sup>①</sup> John Lewis Gaddis, "Containment: Its Past and Fu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5, No. 4 (Spring 1981), p. 80.

没有遏制战略；没有苏联的持续威胁，遏制战略也就不会在如此长的时期内始终占据美国国家大战略的中心位置。

(3) 根据目标和对手设定战略实施的具体目标、主要内容与侧重方式。加迪斯的论述表明，不同政府在遏制战略实施的具体目标、主要内容与所用手段方面有很大差异。杜鲁门政府首创了遏制战略，“新面貌战略”、“灵活反应战略”、“缓和战略”分别标识了历届政府遏制战略的不同面貌。但是，这些面貌各异的战略非但无一逃离遏制战略的基本框架，反而是由遏制战略的根本目标所决定；遏制战略的重心也始终指向美国的最主要对手——苏联。

加迪斯据此指出，遏制战略在冷战的漫长岁月里体现了它高度的内在连贯：“所有的战后美国行政当局都视美国的安全与全球均势的维持紧密相连；所有的战后美国行政当局都视苏联为对全球均势首屈一指的重大威胁；所有的战后美国行政当局都试图运用美国及其联盟的资源来限制苏联日益增长的全局性权势，目的则是为了造就一个美国能够安全生存于其中的多样性的全球政治环境。”<sup>①</sup>

### 2. 遏制战略的手段

加迪斯明确指出，尽管遏制战略在不同政府那里实现了令人惊异的内在连贯，但冷战的历程证明，历届政府在评估其可用的战略手段方面存在显著的歧异，这解释了为什么政府选择两种内容迥异的战略反应方式并创设出面貌各异的遏制战略。

(1) 对称战略提供了抵抗累积性威胁（即对均势的边缘性挑战可以变成重大挑战的威胁）的保护。<sup>②</sup> 对称战略源于认识到美国资源的巨大优势：只要美国愿意，它强大的国力可以发展出无限扩展的手段以实现其目标。无论是杜鲁门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68 号文件（NSC68），还是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灵活反应战略”，都建立在“新经济学”对美国国家资源所持的膨胀性的观点之上。对称战略要求在美国遇到挑战的各个层次给予坚决的、“不多不少”的回击，目的是把冲突控制在可能的范围内，避免出现要么升级、要么受辱的尴尬局面。

<sup>①</sup> John Lewis Gaddis, "Containment: Its Past and Future," p. 80.

<sup>②</sup> 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第 368 页。

(2) 不对称战略注重开拓和挑选合适的反应方式,以免在赢得战役的同时却实质上输掉战争。它关注手段的差异性甚于关注选择的多样性,强调以己之长克敌之短,强调必须据此来谋算采取行动的环境、时间和方式。<sup>①</sup> 不对称战略的理论基础在于认为美国资源的有限性。由于能力有限,利益也必须有限。<sup>②</sup> 所以,必须根据利益的范围确定具体目标的轻重缓急,确定遏制的重点与次要方面,并据此把资源投射到对国家利益攸关的地方,其目的在于降低成本,节约资源,以长制短并占据战略主动权。总体上说来,属于不对称战略“地缘政治编码”<sup>③</sup>的有1950年以前杜鲁门政府时期的遏制战略、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新面貌战略”、尼克松—福特政府时期的“缓和战略”以及卡特政府时期的遏制战略。

加迪斯的论述表明,对可用手段的不同评估导致了历届政府在遏制战略实施的具体内容与主要方式上的分歧,不但造就了两种不同的“地缘政治编码”,也造就了面貌相去甚远目标却根本相同的遏制战略。因此,遏制战略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能体现它在连贯中的流变。

### (三) 遏制战略的衍生与成败

加迪斯特别指出,由于不同政府对遏制战略的推行在连贯中存在着流变,所以必然带来许多缺陷,从而衍生出一些从根本上有违大战略应有机理的“副产品”,并严重侵蚀了遏制战略的效用:

第一个表现是根据威胁来界定利益。加迪斯一再重申,应该根据利益来界定威胁而不是相反。他批评说,自1950年至尼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政府一直习惯于按照看似存在的威胁来界定利益,而不是按照美国安全所必需的、独立推导出来的标准来界定利益。“遏制共产主义”本身已成为一种利益,而不管共产主义作为一股统一的力量究竟可能以什么方式在事实上挑战美国

① 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第369页。

② 同上书,第32页。

③ 加迪斯“地缘政治编码”的概念是指,对于以总统为代表的行政当局而言的关于美国在世界上的利益、对这些利益的潜在威胁和可行的反应的前提性假定,它们在行政当局上台前或上台后不久趋于形成,除非出现非同寻常的情况,此后不会有多大改变。参见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前言部分,第6页。

的安全。<sup>①</sup> 在加迪斯看来,正确的做法应是“将安全等同于捍卫经久的利益,而非等同于击退短暂的威胁”<sup>②</sup>,因为“按照威胁来定义利益,就是将利益变成了威胁的一个派生物——利益由此将尾随威胁的消长而消长”<sup>③</sup>,这样不但等于将利益的界定权交给威胁方——苏联,也导致用扩充的手段追求扩展了的利益。其结果必定损害美国的紧要利益。

第二个表现是痴迷于过程,缺乏专注的目标意识,手段侵蚀目标。如前所述,战后历届政府都把美国至关紧要的利益界定为在一个多样性的世界上维持均势。但是,加迪斯指出,在美国政府内还有一种很有影响的想法,即认为只有美国才能保证多样性:多样性面对的威胁如此巨大,均势如此脆弱,以至华盛顿不能只在其眼前利益被危及时才有所行动。在战后连续不断的紧急事态中,所有的利益都至关紧要,所有威胁都极端危险,所有承诺都必须可信。这就会将美国不知不觉地推入普遍主义:在一个看似危险的世界里,捍卫多样性导致了不分青红皂白的全球主义的大部分代价、紧张和自招失败的后果。<sup>④</sup> 国家安全委员会 68 号文件以及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就是两个典型的范例。

国家安全委员会 68 号文件旨在将遏制战略系统化,它将威胁设想为不可缓和的,将手段设想为可以无限扩展的,从而推导出了一套庞大的利益,使得美国的政治意志不足以对之加以维护。<sup>⑤</sup> 加迪斯认为,杜鲁门政府内部表现出强烈的、没有目标的特点——阔步向前迈进,走入未知领域,而对最终目标是什么、将用多长时间来达到这一目标、它的代价有多大全无清楚的意识。<sup>⑥</sup> 加迪斯对此不无批评地指出,行动的目的不是因为应当行动,而是因为知道怎么行动,为行动而行动的倾向只能造成对战略目的的侵蚀。

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同样“反映了一种目光短浅得出奇的对于过程的全神贯注——以目的为代价的对手段的过度痴迷”。但是,由于对手段的过分痴迷,决策者虽然希望得到意图与成就精确一致的战略,但事实上适得其反。<sup>⑦</sup>

---

① 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第 300 页。

② 同上书,第 143 页。

③ 同上书,第 103 页。

④ 同上书,第 293 页。

⑤ 同上书,第 128—129 页。

⑥ 同上书,第 128 页。

⑦ 同上书,第 253 页。

结果是，“战后对监察自身行事表现得最为敏感的一个行政当局，发觉自己无法解脱地陷入了一场它搞不懂、打不赢、但也脱不了身的战争”<sup>①</sup>。加迪斯得出的结论是，对大战略的决策者而言，目标界定手段，手段不应指导目标，更不能有害于目标。

第三个表现是基于经济考虑的“手段专制”。加迪斯指出：“令人惊奇的是，在塑造遏制战略时，经济考虑竟被赋予至上地位，以至排除其他考虑。一个人不会料到，在如此自觉地针对广大世界做出的主动行动中，竟会见到那么决定性的然而狭隘的关切。”<sup>②</sup>这种对可用资源（特别是经济资源）的不同评估决定了战略在对称与不对称之间的变更；对可供使用的手段的认识，被认为是国家战略的一个最为决定性的成因，从而将历届行政当局局限在做出对称的还是不对称的反应之间进行循环选择上。<sup>③</sup>但是，对称战略有可能使冲突变得更为频繁；不对称战略虽然避免了这种缺陷，但其带来的战争灾祸则更具灾难性。对称战略与不对称战略各自的弊端，这说明需要一种“新型”的遏制战略来打破这一循环。

此外，加迪斯也对凯南和基辛格所设计的遏制战略提出了批评，认为虽然二者的根基在于对欧洲外交史的深刻研习与丰富的哲理性思考，但其共同缺点是如俾斯麦的“合成外交体系”一样，战略机理过于复杂，在理解上、贯彻上严重依赖于战略眼界与决策权威的巧合。概而言之，凯南和基辛格都漠视了大战略缔造与贯彻所必需的国内政治基础。过度依赖“专家智识”和“微调”的结果，不仅是战略操作的部分失灵，也决定了这种精妙的战略难以长期为继。

但是，对于遏制战略的功效，加迪斯在总体上持明确的肯定态度。其最主要理由是，前后连贯的遏制战略不仅有效发挥了遏制斯大林主义、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作用，而且有助于维持住了冷战时期的“长和平”。加迪斯论证说，乔治·凯南在“长电报”和“X”文章里都指出，苏联对外政策是国内影响的产物，不受来自外界的说服、操纵甚或包容的影响。同样，从凯南被任命为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到基辛格辞去国务卿职务的30年里，美国对外政策所奉行

① 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第275页。

② 同上书，第371页。

③ 同上。

的遏制战略在很大程度上也更多的是美国内部因素的产物,而较少地受苏联行为或世界其他地方所发生事情的影响。考虑到这一“内向”性特征,尽管遏制战略有许多矛盾、突变和非理性之处,却仍是个令人惊叹的成功战略。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许多历史学家们将冷战时期视为现代最为稳定和有序的时期之一,而遏制战略对此作用巨大。<sup>①</sup>

### 三、本书的特点

《遏制战略》一书是试图从战略视角解读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努力,具有如下几个重要特点:

第一,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鉴于其源远流长的世系,现实主义的信奉者在个别观点上并非完全一致,但总体上都认为国际冲突是国际关系的突出特征,不过可以通过联盟和均势来予以限制。<sup>②</sup> 尽管未必为作者所接受,加迪斯的阐述进路表明,作者的思维与论述立场足可使我们为其贴上现实主义的标签。通观《遏制战略》一书,利益、威胁、均势占据了显著的位置并被视为美国遏制战略缔造的基石:“现在,对于国际事务,我们需要回到一种关于利益、威胁与可行反应的简单模式。”<sup>③</sup>

值得注意的是,加迪斯多次提到,苏联对冷战的发轫负有主要责任。<sup>④</sup> 他认为,从总体上看,虽然拥有巨大权势的国家经常会为了防御而做出咄咄逼人的侵略姿态,但美国寻求的是在现有国家体系内的安全,而苏联谋求的则是改变现状。<sup>⑤</sup> 在这一点上,他与乔治·凯南不谋而合。

第二,历史、理论的娴熟贯通。如前所述,加迪斯坚持的一项重要观点是,

---

① 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第372页。

② 理查德·罗斯克兰斯、阿瑟·斯坦:《大战略的国内基础》(刘东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题注部分。

③ John Lewis Gaddis, "Containment: Its Past and Future," p. 102.

④ Ibid., pp. 77—79;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mplications, Reconsiderations, and Provoc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92—294; 相关论述亦可参见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第1—19、32—35页。

⑤ John Lewis Gaddis, "Containment: Its Past and Future," pp. 77—78.

理论探究需要历史的积淀,历史考察同样需要理论的升华。《遏制战略》一书很好地体现了他这一学术旨趣:首先,《遏制战略》一书的根基在于历史考察,但又不囿于历史细节的描述与归纳。对于每一届政府遏制战略的施政理念、具体纲领、实施过程以及成败得失,加迪斯都从大战略理论的角度给出了详细分析与评价。其次,该书在大战略理论方面做出了杰出的建树,但所有研究并没有停留于单纯而空洞的大战略理论阐述,相反,所有论述都深深根植于战后美国遏制战略实践的历史进程。加迪斯对大战略机理的杰出展示和拓展一再雄辩地表明:“越是精微复杂的大战略理论性机理,就越有赖于真正的历史学术研究来揭示;或者说,大凡足够精微复杂的大战略理论道理,一般若不诉诸真正的历史学术研究便无法揭示,因而大战略理论本身应有的精致性也无法达到。”<sup>①</sup>可以说,《遏制战略》得以成为战略史名著,从根本上离不开加迪斯对于历史和理论的娴熟结合。

第三,微观史料探究与宏观战略思考的有机连接。事实上,《遏制战略》对于大战略机理的成功揭示与展现不但离不开历史与理论的融会贯通,同样离不开微观史料探究与宏观战略思考的有机连接。正是在后一个层次上,加迪斯很好地诠释了历史与理论的融通之术,完成了对此前冷战史的超越。

就微观史料的精细探究而言,《遏制战略》给人的深刻印象是所用史料的极其丰富。在涉及任何对大战略机理的展示与评析时,加迪斯从不脱离历史实际,所有的研究不仅全部基于大量的私人日记、信件和个人回忆录,同样基于极为丰富和权威的政府报告与解密档案等各种史料。更为可贵的是,这种考察同时体现了加迪斯对精细性与连贯性的追求。《遏制战略》全书共十章以及结语,系统地研究了从杜鲁门到卡特时期的美国历届政府的国家安全政策。加迪斯不但对每一届政府的战略进行了格外详细的考察,而且极为鲜明地突出了遏制战略的前后承继与变更,从而立体化地给出了遏制战略的分述、综述与评价。通过对大量史料的运用,加迪斯展现出用微观史料探究、寻求宏观战略教义的深厚功底。

《遏制战略》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对“超越时间和环境的战略逻辑和战略

<sup>①</sup> 时殷弘:《战略史考察与大战略理论》,《史学月刊》2005年第6期,第9页。

思维方式”的宏观“聚合”。微观探究非常重要,依凭严谨的态度、严格的程序和必要的才智的微观史学探究构成了历史研究的基石和很大部分内容,这恰恰是现代史学的根本方法。<sup>①</sup>但是,“所有要达到深层历史经验和事态内在机理的研究,都必须或明示或隐含地多少超越微观探究层次,进至运用较大尺度的比较、联想、抽象和总体性想象等思想方法的宏观思考”,而“宏观思考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广阔的眼界、总体性的想象和超越较狭隘时空的合理联想”<sup>②</sup>。实际上,加迪斯试图通过《遏制战略》为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寻求的正是这样一项宏观“聚合”,而且是一项战略视角的宏观“聚合”。加迪斯认为,对冷战史过度专注于细节而无总体图景之提炼的研究倾向是不幸的,因而本书被他当作是“一项重新调整对比、以利于‘聚合’的努力”<sup>③</sup>。我们看到,加迪斯所指的战略视角乃是一种出自于对目标与手段平衡关系的科学把握、对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高屋建瓴的大战略式审视与评价。总之,加迪斯通过本书“将充分利用大量原始资料的微观研究与恢弘潇洒的宏观思考结合起来,同时凭借卓越的机理洞察力和概念塑造才华,精彩地揭示了寓于遏制战略史中的许多精微复杂的战略机理。在这方面,他超过了其他著名的大战略阐释者”<sup>④</sup>。

加迪斯的研究扎根于深厚的历史哲理思考传统,既受益于传统,又多有果敢创新。在对历史治学方法进行深刻考察的基础上,加迪斯提出了许多富有洞见的观点,成为冷战史研究公认的领军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加迪斯刷新了人们对遏制战略与冷战的认知,其许多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例如,流行的观点认为,约翰逊扭曲了肯尼迪在越南的政策。但加迪斯通过大量的资料考究指出,肯尼迪的灵活反应战略在越南的实施不但得到了约翰逊的忠实遵守,而且约翰逊所做的甚至超出了肯尼迪本人。<sup>⑤</sup>此外,书中首次提出并予以精彩概括的对称战略与不对称战略概念,也成为学者研究冷战史与遏制战略的重要理论

---

① 时殷弘:《国际关系史料基本分类和主要类别史料例解》,《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3期,第110页。

② 时殷弘:《事实与理论:国际关系史研究的理论化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4期,第14页。

③ 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前言部分,第6页。

④ 同上书,出版说明部分,第376页。

⑤ Lloyd Gardner, "Book Review: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98, No. 1 (Spring 1983), p. 119.

工具。

但是,该书并非无懈可击。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就曾明确指出,对称战略与不对称战略这两个术语过于“整洁”。例如,加迪斯把 NSC68 文件与美国在越南战争的表现都归于对称反应战略,但结果表明,美国的表现不是对称反应而是过度的杀戮。<sup>①</sup>另外,本书的结论过于简洁,加迪斯总结了对称战略与不对称战略的缺点并指出需要一种“新型”的遏制战略,但这种“新型”的遏制战略应该是怎样的,加迪斯并没有给出哪怕是暗示性的答案,他把思考的空间留给了读者。

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时殷弘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年版。

---

<sup>①</sup> Stanley Hoffmann, "Varieties of Containment,"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 11, No. 2 (Jun 1983), p. 280.